

神的历史与历史的神

——中国先秦与古希腊神话源流之比较

易小斌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神话在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各国各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源头。中国和希腊是两个文明古国,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及文明演进过程和方式的不同,因此在神话的形象、内容、思想倾向及历史走向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表现了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和思想伦理观念。中国和古希腊神话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并对后世中西方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神话;海洋文化;大陆文化

神话产生于人类的初始时代,反映了早期人类生活和认识的过程,是原始的先民对世界的认识论和人类本体论的综合形式。神话,宛如一面镜子,深刻地再现着人的本能冲动,朴实地折射了人类精神中接近“底层”的隐秘愿望。由于各个民族的生活环境、文化根基、心理特点等诸多因素的潜在影响,因此,神话在形象、内容、思想倾向及历史走向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对原始神话寻根溯源,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探索人类神话传说发生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

一 根基: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

古代希腊地处欧、亚、非交通要道,具有世界上最为曲折的海岸线,所以具有十分有利的海运和经商条件。古希腊赖以生存的便是海运与经商,人们过着流动的生活,因此古希腊文化是一种开放性的多元化海洋文化。表现在神话中,便是《荷马史诗》中众多的探险活动和军事冒险活动。海运与经商经常要面对变化莫测的环境和挑战,因此,古希腊人不得不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具有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和决断性。面对变化莫测的环境和挑战,古希腊人不得不在生存竞争中依仗强力去掠夺,加上他们娴熟的航海技能、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意志,生存的欲念促使他们在竞争中可能发挥自己的本能,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唯其如此,才能得以生存和繁荣。因而在整个希腊神话中,崇尚的是透露着强烈的非伦理倾向的奥林匹斯众神们强大、神奇、分工细致的力量,所赞美的是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有“力”者。在古希腊神话中,衡量英雄们的标准除了看他在制服猛兽、为民除害的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显赫战功外,更主要的则是看其在保卫家园、攻打其他部落、掠夺财富、俘获女子作为奴隶方面是否也遥遥领先。因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大多是力量和智慧的化身,有关他们的主题“无一例外地都是冒险、掠夺和征服”^{[1]69}希

腊著名英雄赫拉克勒斯一生下来就力大无比,还是婴儿时就在摇篮里扼死了两条巨蛇,成人之后又完成了十二件武功。希腊联军的主将阿喀琉斯明知死在旦夕,却宁愿作为英雄战死沙场,也不愿为了长寿而苟且偷生。伊阿宋为了夺回王位,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去寻找金羊毛。这种注重个性、力量的精神,在希腊完整清晰的神界故事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希腊神王的更迭也是通过暴力方式实现的:老一代的神王生下儿子囚禁或吞食他们,幸免于难的儿子在母亲的支持下起来反抗父亲并取代他的权威。从乌刺诺斯到克洛诺斯,从克洛诺斯到宙斯,所经历的过程都大体相同。宙斯也同样面临着被更新的神所否定的可能性。这种对统治者的叛逆成为希腊神话和悲剧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叛逆者或者成为新一代的神王,或者受到惩罚。但是无论结局如何,叛逆者并不因为反叛正统而被斥为邪恶,反而往往因反叛而变得更加强大和富于魅力。

中国的情况则大相径庭。长江、黄河的滋润和养育,广袤的耕地资源,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国农耕文化的传统。自给自足的中国先民对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习惯并且满足于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这种自然经济所导致的交换的萎缩、交通的不发达、见识的狭隘,却使中国人很早就丧失了探险精神和穷根究底的兴趣,而对超出一小块地域之外的一切感到神秘和不适应。”^{[2]29}陆地上相对的安全状态诱发了人们的依附心理,促使人们滋长追求安全而惧怕风险的心态,注重实际而讲究务实的精神。在尚无能力克服地理障碍的原始社会,中华民族最大的出路是脚踏实地。尽管江河一次次作乱,中国人仍然毫不懈怠地在这里经营。他们希望能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帮助他们解决大旱和洪水泛滥,他们心

*收稿日期:2009-03-10

作者简介:易小斌,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文学研究。

目中的神总是要办点实事的。这样就使得中国神话一开始便带有理性和道德的成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汉民族很快进入文明时代。这样,对自然力的幼稚解释和想象逐渐被不断发展的科学解释所代替。因此,除了较早产生的女娲造人、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后羿射日、黄帝蚩尤之战等神话外,更多的神话传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就难以出现了。同时,定居的农业生产模式形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也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与交往,积淀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观念。“英雄时代”的那种热情奔放、豪迈爽快的史诗创作逐渐被重在实务的散文代替。正如茅盾先生在论中国神话时所总结的那样:“自武王以至平王东迁,中国北方人民过的是‘散文’的生活,不是‘史诗’的生活,民间流传的原始时代的神话得不到新刺激以为光大之资,结果自然是渐就僵死。”^{[3]8}又因为中国较早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形成了大一统的儒家传统,这也使得中国神话为适应政治和道德教化的需要逐步被改造。这就不难理解中国神话何以有如此浓重的伦理性、说教性和社会性的烙印。

二 观念:以神为本与以人为本

在希腊神话中,神是整个庞大宇宙的中心,一切都是围绕神展开、运转。在古希腊人们眼中,神为万物之主,即使连风雨雷电、日月运行、昼夜交替、四季循环这些不可抗拒现象也是由神操纵。神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比如宇宙的统治者宙斯,经常不让人类幸福,自己稍不如意就震怒于人类,就惩罚人类,时时处处显示出他对宇宙和人类的绝对主宰权,以及这种主宰权对人类的绝对威力和威胁。普罗米修斯盗窃天火后,宙斯不但惩罚了普罗米修斯本人,还通过潘多拉的盒子把一切灾难降临人间,并且灭绝了人的希望。宙斯手中的天秤和他门前分别盛着幸福与灾祸的两只坛子,天秤的倒向决定着人的生死,那些只从灾祸坛里分得一点的人“任凭他走遍大地,到处都是忧愁攻心。”^{[4]515}古希腊神话中人间灾难皆因天帝的震怒而降下。荷马史诗中希腊与特洛伊战争的起因是赫拉、雅典娜、阿佛洛狄特三位女神各自为得到写有“献给最美丽的女神”字样的金苹果而引起的。海神波塞冬,因奥德修斯未经他批准私自航海回家而大为震怒,于是兴风作浪,把即将到岸的奥德赛刮到茫茫大海上去漂泊颠簸。就连希腊神话中颇有美名的雅典娜,也因为虚荣生出的嫌怨,派出两条巨蛇活活缠死了预言家拉奥孔父子三人。奥林匹斯山上诸神不仅具有最为美丽、最为健壮的外在形象,同时具有至上的权利和力量。他们俯瞰着人间的一切。人类只不过是他们玩弄于掌心的木偶。

中国神话则不同,中国人向来强调人与自然同情同构,息息相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便包蕴在其中。宇宙间的万物皆为人而存在,连神都是为人类服务的。中国神话中那些被歌颂的具有威望的神或英雄,大都把人生价值的实现投放于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中。他们没有引人注目的外表,但却为人们所称颂,因为他们总是兢兢业业地劳动,锲而不舍、救世拯民。像开天辟地的盘古,炼石补

天的女娲,治理洪水的鲧、禹,发现药草的神农,教民稼穡的后稷等等。他们无不肩负着救民于苦难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在厄运和严酷的自然环境挑战中保护群体生命存在的艰苦任务,他们为了整体利益毫无顾虑地做出自我牺牲,成为美德与贤能的化身。尧虽贵为一国之君,却住茅草屋,喝野菜汤,吃糙米饭,穿粗布衣。舜在任国君的几十年中,做了很多有利于人民的事,以致于他死后,“百姓如丧考妣”。禹为了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开山辟岭,身先士卒,终于战胜了洪水带给人们的灾害。神农为了了解植物的药性“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5]80}他们为人们所称颂的是熔铸在精神品质中的“德行”。所以,在中国的神话中,神不是凌驾于人类之上的,更不是为祸人间的,而是处处为人着想,与人和谐相处,为人类造福的。中国神话反映的是神的济世美德、厚生爱民意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观念。

三 归宿:走向文学与走向历史

严格地说,上古神话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体裁或样式,而是原始人类通过爱与恨、恐怖与希望、欢乐与悲哀等情感和幻想创造的一个特定的表象世界。因此,“神话的真正基质不是思维的基质而是情感的基质。神话和原始宗教决不是完全无条理的,它们并不是没有道理或没有原因的。但是它们的条理性更多地依赖情感的统一性而不是依赖于逻辑的法则。”^{[6]395}上古神话虽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体裁或样式,但它并不排斥文学色彩。

古希腊神话不仅很有文学色彩,甚至可以说是西方后世所有文学形态的源头。古希腊神话具有系统性。几乎所有神话都是以宙斯为中心的神的上层和由英雄们组成的中层与由一般人组成的下层联合构成的,神的谱系,神人的关系十分清晰;整个神话内容也可分为很有系统的一些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把神、英雄、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神话系统。其次,古希腊神话在表现手法上极具文学性。在古希腊神话中充满生动细节,富有感情色彩的描绘比比皆是。在古希腊人看来,文艺是神灵向人类传播旨意的一种方式。因此在神话意识影响下和历史断层的背景下,文艺及文艺人成了神世与人世的心灵沟通者。文艺的这种特殊地位是造成古希腊人文艺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巨大推动力量。在古希腊神话的发展过程中,神话中大量的主题、情节及性格等叙事素材被文艺创作所汲取,并且史诗和戏剧等叙事文学得到长足发展。希腊神话不仅成为后世作家们喜爱的选材,也成为后代文学的蓝本和雏形。希腊神话经历了丰富的时代变迁和历史风云,它几乎成为希腊乃至西方一切文学和艺术活动的源头,对西方文学的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中国先民也存在过对文艺的尊奉。他们也曾有过借助宗教仪式上巫师们载歌载舞的巫术来沟通人神交会的做法。但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使神话最终走向了历史化的归宿。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家长专制”制度,君权神授的观念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先民。在大一统的“家长专制”制度下,黎民百姓的心目中只有现实中的君王,因为现实中的君王直接掌管着他们的一切,而虚幻幻想中的神灵离他们的现

实生活太远。对神话的历史化改造过程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开始,到秦汉以后由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而“子不语怪力乱神”,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对诸神进行历史化改造更是成为史家撰史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例如,中国原始神话中有关五帝的神话。起初五帝是各部落各自的祖神,后来为了使这些相互独立的神符合“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社会模式,“古史神话”中就出现了黄帝讨伐四帝的传说。黄帝成为一统天下、号令四方的天子后,四帝则成为听从黄帝节制的诸侯。然而这种诸侯裂土而治的统治方式却不符合秦汉以降的大一统封建专制帝国模式,于是相互抗衡的五帝又逐渐演变为在时序上相互承传的五个一统天下的人间帝王。司马迁写《史记》,把神话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等统统改造成历史人物。天神失去了原有的神话性质和面貌,变成了体现儒家政治伦理道德观念的理想人君,迥异于古希腊诸神的超乎完美的形象。中国原始神话中绝大多数神灵是人兽同体,形象诡异。有人统计,《山海经》所出现的 450 多个神中,人形神与非人形神的比例约为一比四。^{[7][15]}然而在中国神话的历史化进程中,诸正神的形象被不断地去怪异化及合伦理化。部分形象诡异的远古神灵转化为威风凛凛和德昭日月的近古帝王。《山海经》中的黄帝“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的说法在《史记》中被改变为黄帝乘龙化仙的故事。再如有关西王母的神话,在《山海经·西山经》中是这样记载的:“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历及五残。”而在晚出的《穆天子传》里的西王母形象就进步得多了:“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执玄圭白璧以见西王母……西王母再拜受之……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在这里西王母的形象并不可怕。她似乎有意取悦于周穆王,向他行礼,为他歌唱。神的地位几乎降低到与人王地位相当。这里显然具有王权扩张的痕迹。另一方面,随着“家长专制”制度的确立,那些曾与“家长”发生过冲突的神就不避免地走上了“恶”化的过程。后羿射日有功于人类,但因射死的九个太阳都是天帝之

子,就被说成“不修民事,淫于原兽”的昏君。鲧擅取息壤为民间消灾的传说就演变成鲧野心勃勃觊觎帝位的叛乱“史实”。与颛顼争帝的共工,向黄帝夺天下的蚩尤更是坠入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之列。华夏的智者往往苛求以历史求证神话,以神话求证历史。这种神话与历史双向循环求证的文化惯性使华夏的统治者以神的身份走进了神界,而神界的主宰者又以人的身份走进了历史。诸神普遍具有一种历史化倾向和道德教化功能,原始神话逐渐演变为一部扬善惩恶的历史教科书。

原始神话集中地反映了先民们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形象性的思考和解释,是古代人所进行的精神活动的生动结晶。对于原始神话的寻根溯源,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探索、总结人类神话传说发生、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本民族文化传统和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谢选骏. 神话与民族精神 [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
- [2] 邓小芒. 易中天. 黄与蓝的交响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 [3] 茅盾. 茅盾说神话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4] 斯威策. 希腊的神话和传说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5] 袁珂. 古神话选释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6] 弗雷泽. 金枝 [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 [7] 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 上卷 [M]. 北京: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责任编辑: 卫 华)

(上接第 50 页)

- [2] [英] 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M]. 刘精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23
- [3] [美] 刘易斯·科塞. 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2001: 27
- [4] [英] Elizabeth Wilson. Bohemians: The Glamorous Outcast [M]. London: Tauris Parke Paperbacks 2003: 36
- [5] Bohemian Lifestyle.htm [EB/OL]. <http://Bohemian.com.au>
- [6] [法] 安娜·马于菲吉耶. 浪漫主义者的生活 1820—

1848 [M]. 杭 零, 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1

- [7] [法] 缪塞. 缪塞短篇小说集 [M]. 上海: 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5: 189
- [8] [法] Seigel Jerrold. Bohemian Paris: culture, political and the boundaries of bourgeois life 1830—1930 [M]. New York: Elizabeth Sifton Books 1986: 32

(责任编辑: 黄声波)